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张远新 吴素霞 张正光/著

Yan'an Zhishifenzi Qunti Yanjiu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张远新 吴素霞 张正光/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张远新、吴素霞、张正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 - 7 - 01 - 014743 - 7

I . ①延… II . ①张… ②吴… ③张… III .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1935~1948 IV . ①D66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216 号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YAN'AN ZHISHIFENZI QUNTI YANJIU

张远新 吴素霞 张正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4743 - 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交织下，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奔向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风景。这一潮流形成于30年代中期，1938年至1939年间进入高潮，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时间，“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成了“年轻人的圣城”。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当代表征，是抗日救亡、救国救民的大势所趋，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强烈认同。它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本书以断代史的形式，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基本概况、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历史作用、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及其规律与启示等问题初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全书共分为6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探讨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特征，概述了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了本书研究的意义和主要方法。

第二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本章运用唯物辩证方法、历史学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紧密结合20世纪30—4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深刻分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深层缘由上看，是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

结和社会使命感；从根本原因上看，是 20 世纪 30 年代后，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民族危机达到顶点，救亡图存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社会良知和脊梁的知识分子必然会迅速作出反应；从现实动因上看，是国共两党的抗战政策及抗战表现。即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节节溃败，令许多知识分子极度失望，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立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华民族的希望，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从政策动因上看，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调整则直接推动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第三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内涵及基本特征”。本章借助有限的资料，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概况，包括具体人数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描述；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初到过延安，以追求救国爱国的革命理想为宗旨，并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集合体；着重探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一是来源面广，背景复杂；二是知识层次高，汇聚了一批专家、学者；三是思想上进步，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指导；四是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克服了历代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的缺点；五是改变了阶级属性，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六是实现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

第四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本章认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个群体。它的形成，不仅对中国革命及其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新中国各项事业特别是宣传文教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具体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水平，而且提升了社会和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进步性和合法性的认识与认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其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革命的文教和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其三，大批学者、专家的到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教育和宣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

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四，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对根据地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和民主政治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五，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特别是宣传文教事业中也发挥着领导和骨干作用。

第五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就没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地讲，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深度认同，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事业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基础；第三，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设法吸引知识分子，并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往延安，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现实条件。

第六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成长的规律与启示”。本章认为，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问题的目的不仅在于搞清楚关于这一群体本身的若干问题，更重要的是总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成长的规律的启示，为当代知识分子培养成长和使用提供借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成长的规律与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品质和基本价值取向。第二，蓬勃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第三，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第四，努力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氛围。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从总体上、宏观上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背景、概况、特征、作用和历史地位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和成长规律与启示等问题，而不涉及太微观、特别是一些有较大争议的、非常敏感的问题（虽然由于研究的需要难免会多少有涉及）。这些问题，将来我们会在一些文章中作进一步探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特征	1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17
三、本书研究的意义和主要方法	21
第二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32
一、深层缘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	32
二、根本动因:救亡图存	47
三、现实动因:国共两党的抗战政策及抗战表现	51
四、政策动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65
第三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内涵及基本特征	75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	75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	84
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86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132
一、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认同	132
二、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水平	139
三、为中国革命的文教和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46

四、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185
五、对根据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和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
六、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也发挥着领导和骨干作用	208
第五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	216
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强烈认同,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事业基础	216
二、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一整套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234
三、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258
第六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成长的规律与启示	265
一、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品质和基本价值取向	265
二、蓬勃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273
三、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278
四、努力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是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氛围	287
附 录 本书已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94
主要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2

第一章 导论

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特征

（一）知识分子的内涵及特征

“知识分子”是一个被广泛而频繁使用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这一概念已经有了明确、公认、凝固的定义。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场景不同，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也有不同。

1.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理解

（1）“知识分子”一词的缘由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语汇，最早出自欧洲。据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考证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①现在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三个源头：一是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二是19世纪末的法国，三是20世纪初的英国。

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词，其英文为“Intelligentsia”，直接来源于波兰文“Inteligencja”，1844年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最早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为有别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为维持其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设计了

^①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一套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的教育体系,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国家被列强分割时,正是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压迫的主力军。因此,从其历史意蕴来看,“Intelligentsia”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关心国家大事,富于批判精神的精英分子。在俄国,最早使用“知识分子”一词的是别林斯基^①,但该词为整个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接受并流行开来则是19世纪60年代波波里金使用之后的事。波波里金使用“知识分子”一词的本意,是专指19世纪30—40年代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在彼得大帝时代,由于俄罗斯社会文化落后,彼得大帝就派出大批贵族青年到西欧学习欧洲文化。这些青年贵族接受了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生活方式,回国后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并且他们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最明显的东西,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由于他们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因此,许多时候就被称为“批判性的知识群体”,也被称为“知识阶层”。到了19世纪70年代,那些在哲学、政治、社会见解上持有激进态度的年轻人,声称他们才有资格叫做“Intelligentsia”。19世纪90年代则更进一步,只有那些从政治经济上反对整个旧体制的人才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大致具有以下特点:他们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他们将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他们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他们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他们深信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力求努力加以改正。

法国的“知识分子”一词,其英文为“intellectual”。据学者^②考证,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雷南。早在1845—1846年,雷南(Renan)就曾在他的第一部手稿中使用该词。不过,这部手稿直至1906年才公开出版。若以

①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王增进:《关于“知识分子”词源的若干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公开发表计，则最早使用者为勒努维耶和巴尔贝·都尔维利。巴雷斯则是第一个将“intellectual”与“对政府不满”和“反社会”联系起来的人。但是，真正使“intellectual”一词逐渐流行开来的是始于1894年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A.德雷福斯系犹太血统，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法国总参谋部任上尉军官。1894年9月被指控把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经过秘密审讯，军事法庭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开除其军籍，判处他终身监禁。几年后，情报部查明，真正的罪犯是另一名军官，但军事当局拒不公布真相和改变原判。此举激起社会公愤。1898年当局被迫重审此案，但仍判德雷福斯10年徒刑。此举再次激起社会公愤。不久法国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息民愤。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撤销原判，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德雷福斯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以左拉、克里蒙梭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起了重要作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震旦报》（一译为《曙光》）头版头条上刊出。为扩大影响，该报主编克里孟梭（后来法国著名的“老虎”总统）还在专栏中连续刊登“抗议”，并征求签名支持。1月23日，克里孟梭有感于在“抗议”上签名的人日益增多，便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①他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al”这一形容词用作名词“in-tellectuels”来使用，并用斜体字加以强调，“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替德雷福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从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与社会时弊，成为社会意识的中心。

英国的“知识分子”一词，其英文为“intelligentsia”。该词源于俄语“intelligentsiya”、波兰语“inteligencja”，其拉丁语为“intelligentia”或“intelligence”，也可写作“intelligenzia”，意指“知识（文化人）阶级，头脑劳动

^① 吕一民：《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德雷福斯事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者”^①。据考证,在英国最早使用这一词的为1907年的巴林(M.Baring),以后主要用于指涉俄国与东欧社会的知识分子。至于其含义,《牛津英語词典》的解释为:“起源于俄国革命前,是致力于理智活动的俄罗斯民族的那部分人;被认为是拥有文化与政治主动性的社会阶级。”^②《韦伯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的解释为:“(1)指一个国家内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着清晰、公认、自我意识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阶层,他们宣称或假定自己扮演一种理智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先锋角色;(2)指献身于心智事物方面尤其是艺术与文学领域的人,特别是那些对巨大、深远或抽象问题进行研究、反思与推理的人们;(3)指那些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需要卓越地运用智识的社会阶层,他们从事有别于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③

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三个源头,无论俄式的“Intelligentsia”,法式的“intellectuel”,还是英式的“intelligentsia”,都有各自的特定的内涵。俄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多指一种“身份”(“贵族身份”)概念;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多指一个“职业”(包括作家、教师、律师等)概念;而英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往往突出其知识界或知识阶层之意。但它们却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承认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知识,是社会的良知和脊梁,对社会保持强烈的批判和关怀意识。

(2) 现代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

在现代西方国家^④,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具特色,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视野出发,对“知识分子”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梳理,我们认为,现代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其一,知识分子是指对社会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代表着社会良知、真理和正义的那部分人。

① Kenkyusha's *New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5th, 1097. Tokyo Kenkyusha, 1980.

②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Vol. VII), 10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③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81.

④ 这里所说的西方,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从范围上来说,应该更倾向于欧美的发达国家,俄国、日本等国家暂不包括在此。

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将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并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Lewis Coser)说：知识分子从不满足于事物本身，不满足于习俗惯例，他们从一个更高的、更广大的真理的角度去怀疑现今的真理。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阿隆(Raymond Aron)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依靠批判为生，他的整个地位有赖于恼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梅兹格(Mezger)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而萨义德(Edward W.Said)更是指出：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

既然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和价值是对世俗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理论批判，那么，知识分子就必须具有超人的道德和智慧，并始终站在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立场上。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还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①正如余英时总结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

^①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评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①

其二，知识分子是指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或思想的人。

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称：“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② 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的核心力量或创造者，包括学者、艺术家、哲学家、作家、某些编辑和某些新闻工作者；另一类是文化的传播者，包括各种技术人员，大多数教师、大多数新闻记者。还有一种边缘类型是由把文化用作他们工作一部分的那些人构成，如医生和律师一类专业人员。

叔本华认为知识分子是以启蒙与自我启蒙为旨归，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的人。胡塞尔提出，知识分子是以追求超验事务而与追求经验事业的芸芸众生相区别，并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人。而科塞更是将知识分子界定为“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他说：“不是一切学术研究者或专业人才都是知识分子……才智(intellect)不同于科学技艺所要求的那种技能，他有一种脱离直接经验的能量，它要超越眼下的实用工作，它怀有一种义务感而理解那个超越了职业局限性的价值观……当绝大多数人，包括专业人才都倾向于专业追求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时，知识分子感到了一种超越了直接的具体工作，向‘意义和价值’的更普遍更一般的王国去探求的需要。知识分子在其行为中显示了一种对于社会核心价值的突出的关切。”^③ 哈耶克则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④ 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教师、牧师、演论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③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④ [美]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见《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还包括专业人士和技术员,譬如科学家和医生。这些界定都从职能的角度来界定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知识分子的大致范围。

其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自由飘浮”和“非依附性”。

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而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阶层。把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正因为这样,用社会——经济阶级地位的社会学分析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是注定不得要领的。知识分子的关键特征是“自由飘浮”与“非依附性”。而恰恰是这种“无根性”、疏离性是知识分子可以超越狭隘的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意识形态褊狭,进而达到普遍、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基本前提与必要保证。由于现代知识活动(在曼海姆看来)是由一个不依附于任何阶级、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不局限于社会中的某个给定位置的知识界来承担的,所以,知识分子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谎言(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特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的揭露者。“非依附性”与“自由飘浮”是知识分子获得思想的公正和自由的条件。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观点与此相似,“这种漂泊不定的相对而言不具有阶级色彩的阶层,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无所归属的知识界’”。^①但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又认为,尽管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阶级,但可以构成一个阶级的某种附属物。因为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确实来源于食利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内部,虽然由于分化而不能认为是同一个阶级,但是,在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发挥统一作用的纽带——教育,正是这个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所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教育使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阶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阶层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无所归属”的群体,“这使得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具有了超越性,能从普遍性的、综合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普遍性与超越性正是

^①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知识分子的根本特点”。^①“迄今为止,国外所强调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的‘无所归属’,他们的社会不稳定性。”^②

其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并正在由“立法者”的时代向“阐释者”的时代转换。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正是曼海姆的理论,引导我们超越了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时代,并进入了“阐释者”的时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其作用的变化说明:知识分子的“立法者”的传统职能,正逐渐被另一种职能——“阐释者”职能所取代。“在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最终被放弃,而新角色的轮廓外形——阐释者的角色,逐渐形成。”^③

“立法者”角色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职能的描述。“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④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掌握了一整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所以他们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阐释者”角色是对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职能的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⑤到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所以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齐格蒙·鲍曼还认为,在“立法者”和“阐释者”的关系上,“阐释者”的职能并

① 陆杰荣:《后现代·知识分子·当代使命——论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理论实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②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③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18页。

④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⑤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不含有排斥“立法者”的职能；相反，如果没有对“立法者”职能的继承，“阐释者”职能也是不可能的。

其五，知识分子可分为“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正从“普遍知识分子”向“特殊知识分子”过渡。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知识分子可分为“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普遍知识分子是传统形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关心，采取领导主义的知识分子；而特殊知识分子则是那些专心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依凭专业知识来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而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福柯认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自居，作为普遍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即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衰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特殊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这也赋予了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在福柯看来，从普遍知识分子到特殊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转换，既是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趋势。“特殊型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①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特殊知识分子。

其六，知识分子是一个新阶级，一个由“政治性”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性”的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

艾尔文·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天马行空者，也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成分。知识分子自己就是一个新阶级，“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这两者并不相同)组成的新阶级”^②。“新阶级不是过去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旧的资产阶级，

① 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②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蔡嵘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